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社会关系思想的出场逻辑及其公共性意蕴<sup>〔\*〕</sup>

王洪波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社会关系”思想阐发的重要理论基地。在《手稿》中,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出场逻辑是“异化劳动—异化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关系”,即异化劳动是“异化社会关系”产生之根源,“异化社会关系”主要表现在“人—自”关系异化、“我—我”关系异化和“我—他”关系异化等三个层面。破除异化社会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关系”对“异化社会关系”的超越,这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之必然。这一认识有助于深度把握“社会关系”思想在《手稿》中的地位。深入研究,可窥见《手稿》中社会关系思想并非一般而论的“存在论”,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公共性意蕴,而社会关系思想的公共性开掘是开启“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的另一视界。

〔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社会关系;公共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3.005

社会关系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中占据着重要的轴心位置,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sup>〔1〕</sup>对这一轴心思想的认识和阐发,学界主要存在着“社会关系本体论”和“社会关系方法论”两种解读模式。在宏观的哲学历史观层面,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研究论域,为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进一步深度阐发奠定了前提和基础。然而,深入到马克思的具体经典文本中,深度阐发社会关系思想在其中的文本面向和呈现方式,学界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关系思想之于《手稿》的文本呈现,以此求教于学界。

## 一、从经济事实出发揭示异化劳动是“异化社会关系”产生之根源

言必称希腊,对“社会关系”问题的追问亦是如此。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作者简介:王洪波,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社会哲学等。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研究”(19YJA710036)的阶段性成果。

等,近代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对“社会关系”问题有所论涉。承继前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都“不具有历史性的批判内涵,都是空洞的抽象存在”。<sup>[2]</sup>因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因此社会关系被看成为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逻辑展开之环节的关系,是无历史内容的抽象的存在。作为抽象的概念存在,社会关系多表现为“意识关系”和“范畴关系”。费尔巴哈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其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同样缺乏感性的历史内容,仅仅将社会关系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与黑格尔一样,费尔巴哈的社会关系同样陷入了“空洞的抽象”。

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在《手稿》中,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指认经济领域为问题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经济事实出发,赋予社会关系概念以丰富的、具体的、经济的、历史的内涵,为社会关系思想开辟出了新的、唯物的哲学场域。早在《德法年鉴》后期,马克思就逐渐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sup>[3]</sup>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更直接促成了马克思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研究,随即撰写《手稿》。依据《手稿》,不难发现,马克思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值得注意的经济事实就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则是“异化社会关系”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局限在于抽象地理解经济规律、经济概念。他们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推导,对现实问题只做抽象的回答。而要克服这一局限,就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sup>[4]</sup>马克思以当时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体——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现实生存状况,分析私有制下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其他主体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发现,一个颇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sup>[5]</sup>也就是“异化劳动”。我们熟知的事实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作了四项规定:包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从逻辑关系可见,前两位序异化推导出第三位序异化,前三位序异化最终推导出最后位序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它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sup>[6]</sup>由此分析,马克思指认,通过异化劳动产生“异化社会关系”,也即“异化劳动”是产生“异化社会关系”之根源。与异化劳动一样,“异化社会关系”同样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

一是“人一自”关系异化。为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异化社会关系呢?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可以释此疑问。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sup>[7]</sup>一般而言,自然界是以客观的、自然的形式存在的,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并非自在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社会化的、人化的、人为的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化自然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形式就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然而,在异化劳动逻辑下,“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sup>[8]</sup>工人与本属于他的劳动产品、他创造的社会财富成为对立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异化的。

二是“我一我”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生产性的劳动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对“类本质”的真正占有。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只有运用吃、喝、生育、居住等与一般动物相一致的生物机能的时候,才感觉到是自由自主的活动,而作为“类本质”的劳动活动,却为工人所痛恨。因为生产性的劳动活动并没有让工人感觉到这是彰显类本质的生活样态,反而成为一种仅仅为了延续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谋生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为劳动者与

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突出表现,带来了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异化。

三是“我一他”关系相异化。人(自我)与他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不同阶级间、同一阶级内两个方面。按照生产资料占有情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有产者阶级与无产者阶级。其中,有产者阶级主要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组成,无产者阶级主要由工人组成。不同阶级间的社会关系异化主要表现在,有产者阶级迫使工人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劣势地位。首先,工人的劳动机会与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相联系,“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sup>[9]</sup>其次,工人劳动后获得的报酬,也就是被工业资本家压榨后仅剩的维持自身生活以及延续自己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工资,又即将在另一个领域遭受到银行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的剥削;在同一阶级内的社会关系异化主要表现在,大土地所有者想方设法兼并小土地所有者,大资本家费尽心机吞并小资本家,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将这种现象阐释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强者的权利”。<sup>[10]</sup>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分析,也同样得出“劳动以异化形式构建异化社会关系”<sup>[11]</sup>的结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赋予了它自身以及社会关系以一种‘客观的’性质”,<sup>[12]</sup>或者说,“劳动及其产品创造了一个客观社会关系的领域”。<sup>[13]</sup>异化劳动催生出异化社会关系,并加以固化,使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事实。此种情况下,人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强制,这种强制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种解构,即“由劳动所中介的异化的、抽象的社会关系”<sup>[14]</sup>强行取代自然的或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

从经济事实出发揭示劳动异化是“异化社会关系”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重要环节。借助异化劳动揭示阶级对抗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同人相敌对的性质,启示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揭露它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和压抑,以此来唤醒广大劳动工人的阶级斗争意识。客观分析,从“劳动异化论”到“社会关系异化论”,表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深化。如果跳过“社会关系异化论”,那么马克思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尤其是《资本论》力图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揭示“资本的秘密”等,就缺乏明显的过渡,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线索也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sup>[15]</sup>

同时,这一分析理路体现出对费尔巴哈“类关系”的直接超越,为构建“人—实践—社会关系”的总体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马克思的表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但他看到“异化劳动”事实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并由此经济活动推演出“异化社会关系”,这无疑启发了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属人的关系,根植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并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性延展。

相较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的抽象认识以及关于人的自然关系或理想化的“爱或友情”的狭隘“类关系”的议论,马克思把“建立在直观原则上的人与人的自然关系,改造和理解成在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sup>[16]</sup>看成是属人的社会关系,已经是一大进步。以此为基,马克思在随后的系列著作中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深入批判与全面超越,进而指认“人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关系的存在论根基,逐步构建起“人—实践—社会关系”的总体逻辑。正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尽管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但是他仍旧与一切旧唯物主义一样,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形式上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未从实践出发理解,没有把它们当成感性的人的活动。进而,也只能把抽象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不能根据实践认识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7]</sup>

## 二、从人的解放出发论证“人类社会关系”对“异化社会关系”的超越

马克思语境下的“批判”并非康德式的“纯批判”，其目的在于改造旧世界，建构新世界。为实现人的现实解放，《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了从“异化社会关系”走向“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论探索。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中模糊不清，不能看到“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变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sup>[18]</sup>马克思澄清，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的是“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宗法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消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观念。尽管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远未达到人的解放的应有高度。因为这种革命“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异化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反而通过人的二重化强化了这种异化”。<sup>[19]</sup>可见，在政治上获得自由并不能代表社会已经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政治解放只能被当作人类解放的历史前提。因此，马克思强调，真正关于人的“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sup>[20]</sup>“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对‘人的解放’主题的一次直接而明确的回应”。<sup>[21]</sup>强调人的社会关系解放是走向人的解放的前提基础，或者说，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此为基，马克思在《手稿》中展开了对“人的解放”和“社会关系”的关系分析。

社会关系是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不断延伸与拓展，“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sup>[22]</sup>分析认为，以人的解放为指向，《手稿》中的社会关系大体经历自然社会关系、异化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三个阶段。

无明确解放意识的受自然支配的“自然社会关系”阶段。“自然社会关系”阶段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被动的自然性。尽管这一时期人类的劳动行为逐渐带有社会性，表现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规定，但是，“这类活动与资本主义劳动截然不同，它们无法被充分地理解为工具性劳动”。<sup>[23]</sup>同时，也“不具有商品性劳动所特有的独特综合性质”。<sup>[24]</sup>这类劳动只能被当作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劳动。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难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即便是发生关系，也主要是在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层面。因此，在社会关系受自然支配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尚处于初始阶段，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尚未展现出来，无解放意识也是自明的。

具有部分解放意识的受“物”支配的“异化社会关系”阶段。“异化社会关系”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异化关系。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们从封建的、宗法的和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成为相对自由的独立个体，但其实质是用新的“镣铐”取代了旧的“枷锁”。马克思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以私有财产为代表的“物”，“完成了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sup>[25]</sup>“物”在无形中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的价值标准，成为世界的“神”和主宰，人的一切关系都笼罩在“物”的统治下，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支配、所取代。正如同时期的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所论，“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sup>[26]</sup>“人的关系的颠倒”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社会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界完全沦为人的财富来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社会不同阶级间与同一阶级内都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劳动并没有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成为人奴役自身的手段。

全面解放的受“人”支配的“人类社会关系”阶段。这个“人”并不是黑格尔眼中以“抽象的精神的劳动”<sup>[27]</sup>作为本质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以“爱和友情”作为类本质的人，更不是国民经济学家“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sup>[28]</sup>而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物”，<sup>[29]</sup>即在现实生



活中,人既作为生物的、生命的自然存在,又作为意识的、关系的社会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人”和谐共生于“人类社会关系”阶段。这个阶段“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sup>[30]</sup>是人的全面解放。有学者也指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不把人的发展和解放简单地归结为劳动能力的发展。因为劳动能力范畴内的生产能力、政治力量、精神力量总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精神关系下才能表现出来。<sup>[31]</sup>

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关系”超越“异化社会关系”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前资本主义时期也是个人解放的必要历程,但只有在个人遭受最严重的异化和最深重的压迫时,他才意识到自身解放的需要,才能思考解放的现实条件。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以一种异化的、具有动力结构的“人造”社会关系代替了传统的“自然”社会关系后,人类遭受异化最严重、压迫最深重的阶段就来临了。这一阶段充分发展后,终将被“人类社会关系”所取代。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人类社会关系”中,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sup>[32]</sup>那时,个体不再是单纯依赖于“物”的原子式存在,而是作为自由人处于理想的、真正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即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sup>[33]</sup>也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34]</sup>

诚然,此时马克思尚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出发论证“人类社会关系”对“异化社会关系”的超越,但从人的解放出发,通过历史逻辑的推导,已经彰显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深度开展的理论向度。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正因此,马克思才能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关系”构建生成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基础。

### 三、《手稿》中“社会关系”思想的公共性意蕴

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公共性“正在成为人类当代历史的前所未有的新的特质”。<sup>[35]</sup>以卢梭、康德等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以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公共性”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发。然而,这些阐发基本上停留“在观念层面理解公共性”,<sup>[36]</sup>试图通过观念的方式方法界定现实世界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比较分析,马克思一贯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理论建构,反对在纯粹理性思辨过程中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进言之,马克思所理解的公共性<sup>[37]</sup>“是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公共性,是一种社会关系属性的公共性”。<sup>[38]</sup>在《手稿中》,马克思在阐发社会关系思想的过程中,揭示了异化社会关系是对公共性的背离,强调只有过渡到人类社会阶段,公共性才能真正实现。

首先,人的“类生产”活动是建构社会关系的活动,也是公共性的活动。公共性是相对于个体性、私人性而言的,是建立在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共在、共建、共处、共享的生活状态,是“自我在确证自己过程中所体现的为他的属性”。<sup>[39]</sup>从历史纵向看,“公共性的要义就在于它对遵循自然法则的纯家庭私人生活方式的超越,第一次突显出人的‘类’特征和不同于自然的属人特征”。<sup>[40]</sup>人的“类”特征脱离动物界,人类劳动逐渐超越家庭的私人劳动,由纯粹的谋生手段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由生物本能变成被意识到的自主能力。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得到真正的证明。通过作为“类”特征的劳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sup>[41]</sup>在持续性和广延性的劳动过程中,公共性逐渐显现。尤其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无论每个劳动者是否愿意,都不得不进入社会的分工体系,加入到公共性的、共同的社会劳动生活中。在共同的、公共性

的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关系被加强。个人间开始结成一定的关系群体,每个人都是关系体中的一部分,个人的得与失和他人、关系体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对此,汉娜·阿伦特则不以为然,她认为人类劳动与公共性无相互关系,指出公共性体现在政治领域。尽管阿伦特指出只有公共性领域才是人类的专属领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世界”,但是在她的语境中,人类劳动却与公共性毫无联系。她认为,劳动与工作、行动一起构成了人类的三种活动。其中,劳动处在最低端,并且“总是在同一个循环上轮回,这个循环是生命有机体的生物过程规定的”,<sup>[42]</sup>即一种以新陈代谢为基础的自然性活动,表征着人类完全从属并依赖于自然的生物行为。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生活方式的共同特征,既不能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也不能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分离开来。这完全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活动,不依赖他人存在,属于私人领域。同时,阿伦特强调,在多元个体下同时发生的叫“行动”,行动是人的境况中最彰显人性的一面,也是人类社会中最彰显公共性的一面。行动集中体现为政治活动。因此,在劳动与公共性方面,学者们批判,在阿伦特视域下,“劳动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sup>[43]</sup>不能体现公共性,而“公共领域属于政治领域”,<sup>[44]</sup>劳动只能归结为私人领域。很明显,阿伦特这里犯了两点错误,一是妄图通过给“劳动”新的界定以及增加“工作”“行动”等词语、概念解构马克思对“劳动”的科学认识,二是未能认识到作为“类本质”的劳动在人的自我确证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交往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异化社会关系”背离公共性。本来,人类展现本质力量的劳动活动应该是促进公共性的构建,“人这种能动的类的生活对自然界逻辑上的主动性就是人的类的固有的公共性的最本质的体现。”<sup>[45]</sup>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过程中,公共观念、公共理性和公共意识得以延展和深入。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作为一个纯粹的手段而存在,成为了获取产品、享受的工具,即劳动与生产性活动的实质性质之间的内在关系断裂。劳动便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又催生了“异化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sup>[46]</sup>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全面异化的形式展开,人与劳动、人与劳动对象、人与劳动产品、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同样表现在人与人、与他人劳动、与他人劳动产品等方面。在这种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下,人是完全丧失本质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7月撰写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耐、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sup>[47]</sup>可见,“异化社会关系”所属的社会形态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公共领域,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是虚假的公共利益”,<sup>[48]</sup>最终也只能是对公共性的背离。因此,公共性的最终实现与人类摆脱“异化社会关系”走的是同一历史发展道路。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具备“一种超越现实私有制关系的一种公有产品共同占有的公共性立场”,<sup>[49]</sup>并以此为出发点期望确立一种真正属于人的公共性关系。结合《手稿》,这种“真正属于人的公共性关系”就是“人类社会关系”阶段,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人类社会关系”彰显公共性。公共性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间的“共在、共生、共创、共享和意义共契”。<sup>[50]</sup>只有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多元主体的个体性与“共在、共生”等公共性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有效地“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sup>[51]</sup>那时,人们公共地占有生产资料,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共在的权利,共建的能力,共处的意识以及共享的欲望。人们彻底摆脱了以往个体、分工、地域、民族的狭隘局限性,摆脱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与统治,形成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联系。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精神关系、伦理关系、宗教关系全面生成。即便人们在一些特殊领域或者“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時候,

我也是社会的”，<sup>[52]</sup>不会因为工作、性格、性别、身份等主体性差异而削减社会性，主体性与社会性完全相统一，即主体性是以社会公共性为前提的充分主体性，社会公共性是人的主体性充分发展的真正公共性。<sup>[53]</sup>

当代人类追求公共性的特定诠释和重要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固有的公共性本质，并且把这种既自然又人文的世界公共性通过人的活动自觉地还原出来。因此，在21世纪，需要立足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培育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性精神，彰显人类生活的公共性维度，实现人类社会关系构建的共同目标。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示了“异化社会关系”的根源及其具体表现。进而，立足人类解放的立场，论证了“人类社会关系”超越“异化社会关系”的历史必然。这些重要认识构成《手稿》中“社会关系”思想的重要面向。在分析和阐述过程中，发现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思想存在着深刻的公共性意蕴，而在“公共性”意蕴的开掘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开启“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新的视界，而这一“视界”的真正的、普遍性的呈现则需要我们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 注释：

- [1]刘兴盛：《“社会关系”：把握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关键范畴》，《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 [2]毕国帅：《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价值旨趣、实践意蕴与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 [4][5][6][7][8][9][10][17][18][20][25][26][27][28][29][30][32][33][34][41][46][51][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64、165、193、124、116、83、501、527、46、182、95、205、125、188、189、189、185、185、163、163-164、188、188页。
- [11][12][13][14][23][24][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3、201、201、202、200-201、201页。
- [15]参见刘秀萍：《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聂锦芳主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
- [16]高云涌：《社会关系逻辑：马克思辩证理论的合理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 [19]溥振峰：《人的异化与解放——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人权哲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 [21]刘同舫：《论“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对“人的解放”主题的开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 [22][49]贾英健：《公共性视域——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0、243页。
- [31]参见乔翔：《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 [35][50]袁祖社：《公共性与马克思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5、99页。
- [36]桑明旭：《关于“公共性”的唯物史观阐释》，《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
- [37]在《手稿》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未发现“公共性”一词，但有“公共”一词，包括公共福利、公共场所、公共团体、公共集会、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公共生活等。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公共性思想。消灭异化的、私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
- [38]李昕桐：《“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基础——马克思“现实的公共阐释”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5期。
- [39][53]王洪波：《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公共性意蕴及其现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6期。
- [40][45]郭湛、曹鹏飞：《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 [4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 [43]张航：《在“劳动”与“行动”之间——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及其评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 [44]陆自荣：《马克思的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兼析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批判》，《求是学刊》2020年第2期。
-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 [48]莫春菊：《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立场、主旨和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汪家耀]